

汉

魏

六

朝

傅正义 康清莲 陈碧娥 著

文学论谭

史文出版社

傅正义
康清莲
陈碧娥
著

汉魏

六朝

文学论谭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科技与教育研究文丛: 汉魏六朝文学论谭/傅正义 康清莲
陈碧娥 著.-北京:中央文献出版社,2006.5

ISBN 7-5073-2109-6

I. 汉… II. ①傅…②康…③陈… III. 文学论谭-研究-汉魏六朝
IV. ①G40-53②F20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3651 号

汉魏六朝文学论谭

著 者 / 傅正义 康清莲 陈碧娥

责任编辑 / 于俊道

出版发行 / 中央文献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西西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

邮 编 / 100017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

850×1168mm 32 开 9 印张 240 千字

2006 年 6 月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73-2109-6 定价:23.00 元

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作

者

简

介

傅正义

(1949-),男,湖北武汉人,重庆工商大学教授,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带头人,硕士研究生导师。历任渝州大学中文系副主任、主任、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。重庆市三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,重庆市文学学会常务理事,重庆市古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。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,所授“古代文学”课程,评为校优质课程、精品课程;已出版学术专著、教材6部,发表论文近50篇,多次获省市科研奖、全国优秀图书奖。

康清莲

(1967-),女,四川南江县人,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,文学硕士,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巴渝文化的教学与研究。重庆市古代文学学会理事。

陈碧娥

(1972-),女,重庆人,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,文学硕士,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的教学与研究,已发表论文多篇。

前 言

多年辛勤耕耘在高等院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科研这片土壤,虽也“晨兴理荒秽”,但却“草盛豆苗稀”,偶有收获,不敢自珍,希望能与同行同道、同学诸生同叙共享,就教于方家。

汉魏六朝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,正如李白所说“蓬莱文章建安骨,中间小谢又清发”(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),涌现出大批优秀的作家、作品,极富于艺术探索精神和文学创新品格,是中国文学披荆斩棘,走向觉醒、独立的时期,是唐代文学一代繁荣的酝酿、准备时期。

本书名曰《汉魏六朝文学论谭》,希望能以该阶段文学发展史为纵轴,为y轴,以该阶段重要作家、作品为横轴,为x轴,建立起一个坐标系统,以期较系统地论述该阶段文学发展的水文源流情况,揭示其脉络,把握其精髓。

“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。两汉文学之代表,即汉赋、汉乐府和历史散文。

中国历史散文的“双子星座”——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,虽然一出于西汉,一出于东汉,却如日月高悬,光照千秋,各有其



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品味,各有其强大深远而又独具特色的艺术辐射,《〈史记〉、〈汉书〉比较论》即从历史散文而非纯史的角度,对二书的特质异同作了较全面、准确而又简明扼要的比照论证。《〈史记〉人物传记“引入法”艺术特征》分析、归纳了《史记》人物出场的总总艺术描写手法。《〈史记〉的言外之旨》则揭示了《史记》旨微语婉,意在言外的良史笔法。

汉赋于两汉,可谓风云际会,轰轰烈烈,几乎独霸文坛。文人学士心慕手追,趋之若鹜,“朝夕论思,日月献纳”(班固《两都赋序》),或“追风以入丽”,或“沿波而得奇”(刘勰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),高潮迭起,盛况空前,这说明汉赋作为一种新文体,必有其鲜明独特的文体风格特征和非同寻常的艺术渊源。《汉赋文体风格特征及艺术渊源比较论》即从汉赋文体特征入手,用比较的方法,具体分析了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荀赋及战国散文与汉赋文体的渊源关系。《司马相如的末代纵横家心态及其对汉赋的影响》则从汉赋的奠基者、天才赋家司马相如的创作心态、文化心态的角度,揭示了战国纵横家——末代纵横家司马相如——汉赋之间的文化艺术联系,有利于对汉赋文体形成的理解,也有利于对司马相如赋独特艺术风格的把握。“汉赋四大家”,其中司马相如、王褒、扬雄“三大家”皆巴蜀人,当时巴蜀荟萃秦文化、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,滋养、培育了“巴蜀三大赋家”,为两汉文学及文化的发展,作出了卓越的贡献,《汉赋“巴蜀三大家”述略》即着笔于此,简述了他们的艺术风格、艺术渊源、艺术成就,及其对汉赋的独特贡献。

汉乐府是继“诗经”、“楚辞”之后,中国诗歌发展的第三座高峰,它以杂言为主,渐趋五言的艺术形式,对唐代杂言歌行体有着深远的影响,并掀起中国诗歌五言的时代;它“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”的创作方法,上承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,下开建安



拟乐府、唐代新乐府,形成并深化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,并标志了中国叙事诗歌的成熟。为准确把握它的风貌特质,本书将它置于后面,与南乐府、北乐府比较言之。

以上为两汉文学论。

建安时期掀起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文人诗的高潮,形成五言古诗的黄金时代,并以“建安风骨”的艺术风格,衣被万代,享誉诗坛。由于它在中国诗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,自然也是本书论述的重点。建安文学的时限——起于何时,止于何时,至今众说纷纭;建安文学的地域——包不包含吴、蜀文学,至今也见仁见智;这是学习、研究建安文学不可绕开的“门槛”;《建安文学时限、地域辨》分析了众说,进行了辨析,提出了自己的意见。建安文学一代繁盛,它有着什么样的艺术土壤、生态环境?《建安文学的时代背景和艺术土壤》对此作了回答。建安文学一代风流,“建安风骨”垂式千秋,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风格特征、艺术品格?《建安文学的艺术品格》作了较全面的论述。魏、蜀、吴三国,鼎立并峙,然魏诗灿烂辉煌,“风景这边独好”,而吴、蜀诗坛“吟咏靡闻”,一片凋零,何以如此?学界虽有所关注,但至今尚无专文论述,《三国时期吴蜀文人诗歌凋敝原因探析》从魏、蜀、吴三国的文化传承、领导学养、用人标准、教育状况等方面的比较分析中,作了较深入地探索。

以上为建安文学的总论。

建安文学以诗歌为代表,以“三曹”(曹操、曹丕、曹植)为核心,把握了“三曹”便把握了建安,把握了中国诗史上文人诗的第一个高潮,把握了五言古诗“彬彬之盛”的一个时代。然“三曹”诗歌异中有同,同中有异,各领风骚,各成绝技,它们总起来交织了建安诗歌一代繁荣的局面,分开来,又各以其独特艺术成就,沾溉后人,辉映千秋。《“三曹”诗义比较



论》、《“三曹”诗歌艺术比较论》、《“三曹”游仙诗比较论》则分别从内容、艺术、游仙诗的角度作了比较论述。

以上为“三曹”诗歌的比较论。

陈贻焘的《论诗杂著·评曹孟德诗》喟然叹曰“评诗不易，评孟德诗尤难。”^[1]一来曹操诗十不存一，亡佚太大；二来曹操重刑名法术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古代中国，常被“目以汉贼”；这也必然祸及其诗，影响到对曹操诗的正确评价。拨正思想的偏见，余以为曹操对中国诗史有三大开拓性贡献，一为建安诗性精神的开拓者，二为“建安风骨”的开拓者，三为建安文人诗现实主义传统的开拓者；这三大开拓集于一身，所以，曹操是开建安一代诗风的诗人和领袖；《论曹操对中国诗史的三大开拓》力求对曹操诗歌作出公正的历史性评价。

建安诗歌的发展，是汉乐府民歌和汉末文人诗这两大源头交汇融合而高潮迭起的过程，是汉乐府民歌向文人诗转化的过程。学术界对曹操在这转化过程中的贡献，有些漠视甚至无视，《论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》即从六个方面论证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特殊贡献。而《论曹丕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发展性贡献》也从六个方面论述了曹丕的贡献，如果说曹操的贡献多为宏观性、战略性、开创性的，那么，曹丕的贡献则更多体现在艺术表现、艺术风格等微观的、战术性、发展性的层面。

曹植为“建安之杰”，古人将曹植列入“古今三大诗家”（胡应麟《诗薮·内编》卷二）或“古今四大诗圣”（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卷七），但也有人贬损他，说他“语意俱平，无警觉处”（叶燮《原诗·外篇下》），说他“排当沓合，了无生气”（王夫之《古诗评选》卷二），究竟该怎样评价曹植，实事求是地确立曹植在中国诗史的地位？《“一代诗宗”曹植》总结了曹植对中国



诗史的四大贡献,尊曹植为“一代诗宗”。《中国诗史“二源”合“一流”嬗变大势的初步确立者——曹植》以为中国诗歌有两大源头,一以《诗经》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,一以《楚辞》、《庄子》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,中国诗歌长河的大势流变为这“二源”合“一流”,曹植囊括《风》、《雅》,组织《庄》、《骚》,得《汉乐府》精髓,发《十九首》意象,继往开来,初步确立中国诗歌这“二源”合“一流”的嬗变大势,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重大贡献。《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——曹植》认为,建安是中国诗歌“本乎性情”的历史转关,曹植诗“千悲万恨”(庾信《伤心赋序》)、“汹涌而后发”(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卷上),以其众多的数量、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、缘事、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,徘徊游移,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,从此,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,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又一杰出贡献。《中国诗歌的“壮美”品格及文质相称、情文并茂发展道路的初步确立——曹植》认为,《诗经》天然古拙;《楚辞》自然流丽;《汉乐府》则质朴无文;《古诗十九首》则平易淡远;中国诗歌体被文质,追求壮美的美学品格及发展道路的初步确立,当在建安时期;然建安诗人中,曹植诗“骨气奇高,词采华茂,情兼雅怨,体被文质,粲溢今古,卓尔不群。”(钟嵘《诗品》卷上)最典型地体现了建安诗歌文质相衬、情文并茂、华丽壮大的一代诗风;而曹操诗骨气有余,词采不足;曹丕诗词采尚可,骨气偏柔;王粲诗文秀而质弱,刘桢诗气壮而辞质;因此,我们可以说是曹植一改中国诗歌简朴直拙的风格,初步确立中国诗歌“壮美”的艺术品格和文质彬彬、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。

以上是“三曹”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论。

正始诗歌有“建安余风”之评,诗家也每以“汉魏”并称,总谓“汉魏风骨”。《建安与正始诗歌比较论》将“三曹”、“七



子”与阮籍、嵇康等正始诗人作一比照论析，以期准确把握建安、正始诗风的异同特质，把握“建安七子”、“竹林七贤”的创作风貌和艺术品格。《阮籍〈咏怀诗〉审美意象的多重性》则从审美意象的角度，分别从朦胧性、哲理性、情感性几个层面进行探讨，力图还原其审美艺术的本真面目。

以上为正始诗歌论。

陶渊明不仅“晋宋之间，一人而已”（蔡正孙《诗林广记》卷一），不仅是汉魏六朝文学的中流砥柱，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诗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。然陶渊明对中国诗歌艺术境界究竟有何贡献？他的艺术创新是什么？《论陶渊明对中国诗境的七大开拓》认为，陶渊明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位杰出的田园诗人、隐逸诗人、平民化诗人、哲理诗人、儒道释融合而臻化境的诗人、首开平淡自然之风的诗人、首创无我之境的诗人；这七大开拓，奠定了陶渊明古今一流诗人的崇高地位；陶诗也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堡垒、精神归宿和心向往之的最高艺术境界。

意境是中国诗歌最为独特的审美理念和艺术观照方式。王国维将中国诗歌意境分为“有我之境”与“无我之境”。陶渊明奠基中国诗歌“无我之境”的艺术境界，这也是陶渊明对中国诗歌艺术的一大贡献。陶渊明之所以成为“无我之境”的奠基者，有其深刻的美学及文化的背景。这是《中国诗歌“无我之境”的开创者——陶渊明》所要论证的观点。

以上为陶渊明诗歌论。

晋宋是我国山水意识觉醒，山水诗形成的时期，正如刘勰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所说：“宋初文坛，体有因革，庄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。”诞生了山水诗的创始人谢灵运，并与齐朝著名山水诗人谢朓，并称“二谢”，享誉南朝，驰名诗史，对南朝山水诗、盛唐山水诗，乃至中国山水诗有着重大影响。《论谢灵



运与庄子哀怨的狂人情结》论述谢灵运与庄子乃千载相关的“知音狂人”，这对理解谢灵运其人其诗将有所帮助。《“二谢”山水诗比较论》对照论析“二谢”山水诗的风貌神髓，勾画了南朝山水诗向盛唐山水诗演进的轨迹。

南、北乐府民歌是继汉乐府民歌之后的又一次民歌大集结。《汉乐府、南乐府、北乐府比较论》从四个方面简明扼要地比较了汉乐府、南乐府、北乐府民歌的异同风貌；说到底，它们分别带有乡村文化（或农业文化）、都市文化（或商业文化）、草原文化（或游牧文化）的一些典型特征。

以上所论，有点，有面，有线，它们上下勾连，左右映带，通过其内在的逻辑性和系统性，体现了整个汉魏六朝文学史的脉络体系。限于学智，错谬之处在所难免，权作一砖一石，置于路基，或许有用。

注：[1] 陈贻焮.论诗杂著.北京大学出版社.1989:8

作者

2006年元月



目 录

前 言 / 1

【第一章 两汉史传论】 1—33

第一节 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比较论 / 1

第二节 《史记》人物传记“引入法”艺术特征 / 15

第三节 《史记》的言外之旨 / 25

【第二章 两汉辞赋论】 34—65

第一节 汉赋文体风格特征及艺术渊源比较 / 34

第二节 司马相如的末代纵横家心态及其
对汉大赋的影响 / 42

第三节 汉赋“巴蜀三大家”述略 / 51



【第三章 建安文学论】 66—105

- 第一节 建安文学时限地域辨 /66
- 第二节 建安文学的时代背景和艺术土壤 /76
- 第三节 建安文学的艺术品格 /85
- 第四节 建安诗歌繁兴而蜀吴诗歌凋敝原因探析 /95

【第四章 “三曹”诗歌比较论】 106—129

- 第一节 “三曹”诗义比较论 /106
- 第二节 “三曹”诗歌艺术比较论 /114
- 第三节 “三曹”游仙诗比较论 /123

【第五章 曹操、曹丕与中国诗史】 130—166

- 第一节 曹操对中国诗史的三大开创性贡献 /130
- 第二节 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 /139
- 第三节 曹丕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发展性贡献 /148
- 第四节 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的时代意义 /158

【第六章 曹植与中国诗史】 167—200

- 第一节 “一代诗宗”——曹植 /167
- 第二节 中国诗歌“二源”合“一流”嬗变大势的
初步确立者——曹植 /177
- 第三节 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——曹植 /185



- 第四节 中国诗歌“壮美”品格及文质相衬、情文
并茂发展道路的初步确立者——曹植 /193

【第七章 正始诗歌论】 201—223

- 第一节 正始诗歌与建安诗歌比较论 /201
第二节 论阮籍《咏怀诗》审美意象的多重性 /215

【第八章 陶渊明诗歌论】 224—245

- 第一节 陶渊明对中国诗境的七大开拓 /224
第二节 中国诗歌“无我之境”的奠基者——陶渊明 /234

【第九章 南北朝诗歌论】 246—267

- 第一节 论谢灵运与庄子哀怨的狂人情结 /246
第二节 谢灵运与谢朓山水诗比较论 /252
第三节 汉乐府、南乐府、北乐府民歌比较 /261

后 记 /268



第一章 两汉史传论

第一节 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比较论

〔摘要〕《史》、《汉》为我国古代历史散文之典范。比较而论，体例上，《史》发凡起例，创千古之业，《汉》完善定型，为不祧之宗；思想倾向上，《史》明天人之分，《汉》主天人感应；《史》通古今之变，《汉》调上下洽通；《史》成一家之言，《汉》守圣人之道；人物塑造上，《史》明善恶，《汉》辨忠奸；《史》重传情，《汉》重传事；《史》重为人，《汉》重为文；《史》爱奇，《汉》重实；组织结构上，《史》神明变化，《汉》严谨缜密；语言风格上，《史》错综成文，《汉》骈散一体；《史》雅俗共赏，《汉》雍容尔雅；《史》笔端含情，《汉》不甚动情。总之，《史》为正史与杂史的巧妙结合，《汉》开后世正史一途；《史》为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结合，《汉》开后世纯史一路。
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与班固的《汉书》，可谓两汉史学的“双子星座”，也是中国史学史，乃至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。世人也每以“马班”并列、“史汉”并举；“马班异同”也成为史学界



“永恒课题”之一，被人们研究、考证，议论迭出，其言甚详。本文无意作纯史学比较，而是从历史散文的角度，作一简明扼要的对比审视。

一、体例

《史记》发凡起例，创千古之业，《汉书》完善定型，为不祧之祖。《史记》上自黄帝，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，“究天人”、“通古今”、“考其行事，综其终始”^①，全面叙述了我国古代三千年间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情况。而《汉书》从“汉绍尧运”出发，对《史记》将汉史“编于百王之末，厕于秦、项之列”^②大为不满，于是改《史记》的通史撰述为断代为史，上自汉高祖元年（前 206 年），下迄王莽地皇四年（23 年），“究西京之首末，穷刘氏之废兴”，仅取西汉一代 230 年间的史实。虽然通史、断代，各有优劣，且后世史家多取《汉书》断代体例，但班固的出发点实在难以恭维。

《史记》首创纪传体例，它包括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五个部分，“本纪”叙帝王，“表”系时事，以时间为纲，有编年体之长；“世家”记诸侯，为各诸侯国的历史和开国功臣的传记，有国别体之长；同时，“本纪”、“世家”、“列传”又以人物为中心，避免了编年、国别二体人物活动不清之短；“书”详制度，记载了无法纳入上述四部分，且又十分重要的典章名物制度。《史记》以此五部分，综合为一书，且各部分相互配合、补充，构成完整体系，从而为全面展现广阔复杂的社会历史生活，创造出最佳的古史体例，故郑樵的《通志》有“百代以下，史官不能易其法”的赞誉。一部二十四史，包括《清史稿》、《新元史》，一共二十六史，皆承袭《史记》纪传体例。《汉书》作为第二部纪传体史书，只是在《史记》的基础上的整改。它只有纪、表、志、传四部分，本纪、列传全用《史记》的形式；合世家于列传，因汉代诸侯为虚封，并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，世家已



失去单列的意义；表不取《史记》大事年表形式，而以贵族世系为主；又因其名《汉书》，故改《史记》之“书”为“志”，以示区别。另外，合《史记》的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为《礼乐志》，合《律书》、《历书》为《律历志》，改《平准书》为《食货志》，《封禅书》为《郊祀志》，《天官书》为《天文志》，《河渠书》为《沟洫志》，别增《刑法》、《五行》、《地理》、《艺文》四志。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曰：“《尚书》一变而为左氏之《春秋》，《尚书》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，以纬经也；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，左氏依年月，而迁书分类例，以搜逸也；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，迁书通变化，而班氏守绳墨，以示包括也。就形貌而言，迁书远异左氏而班氏近同迁书。”的确，司马迁首创之功远胜班固，但班固完善定型之功也自不可设。《汉书》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，特别是“十志”对《史记》“八书”的合、改、增设，不仅使其更合理、更完善，并且开拓了更广泛的史学领域，保存了更完整、更丰富的社会文化史料，因此，自《汉书》以后，以纪、表、志、传为组成部分，并且断代为史的体例，成为后世修史的标准。同时。正因为《史记》发凡起例，首创一体，不免有“条例不经”^①之处，《史记》的纪、传、书之间，有时界限不很明显，《汉书》则明其界限，严其体制，事载于传，撮其要书于纪，志则一律记典制文物；《史记》也有篇章序列不当之处，《汉书》则梳其条理，编排缜密；《史记》的篇名，或称名，或称号，或称其职，或称其爵，《汉书》则整齐划一，定于一律。故章学诚又谓“迁《史》不可为定法，固《书》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，遂为后世之不祧之宗焉。”^②充分肯定了班固继承《史记》体例而加以完善定型的贡献。

二、思想倾向

（一）《史记》明天人之分，《汉书》主天人感应

两汉经学的核心为“天人感应”说，特别是汉武帝“罢黜

